

岳麓书院学术文库·湖湘文化研究系列 朱汉民 主编

清代

湘学研究

朱汉民 主编

晚清湖湘之地成为中国学术文化异常活跃之地，引起了全国乃至世界的关注。这一段时期
的学风之盛，集中体现在主流的学术形态——经学方面：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宋学等不同派
别，均有一些代表性人物。尤其突出的是：晚清湖湘经学在学术旨趣、学术风格上，最鲜明
地体现出湘学传统追求的“道”、“学”、“治”统一的特征。

湖南大学出版社

岳麓书院学术文库·湖湘文化研究系列

朱汉民 主编

清代

湘学研究

朱汉民 主编
吴仰湘 副主编

湖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学术会议论文集。共选收论文 28 篇,大体上展现了近年来海峡两岸学者在清代湘学领域的研究成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湘学研究/朱汉民主编.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12
(岳麓书院文库·湖湘文化研究系列)

ISBN 7-81113-007-6

I. 清... II. 朱... III. 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湖南省

清代—文集 IV. B24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9646 号

清代湘学研究

Qingdai Xiangxue Yanjiu

作 者: 朱汉民 主编

责任编辑: 肖立生

责任校对: 张建平

装帧设计: 吴颖辉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 410082

电 话: 0731-8821691(发行部), 8821594(编辑室), 8821006(出版部)

传 真: 0731-8649312(发行部), 8822264(总编室)

电子邮箱: press@hnu.cn

网 址: <http://press.hnu.cn>

总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装: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邵阳)

开本: 880×1230 32 开 印张: 20.75 字数: 595 千

版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 000 册

书 号: ISBN 7-81113-007-6/K·22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总 序

朱汉民

光绪二十七年，清廷下诏全国教育改制，废书院、兴学堂，延续千年之久、遍布全国各地的书院制度被废除，而其中一部分书院则改制为近代学堂。曾在中国书院史上一直极负盛名、并且是“天下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后，经过一段学制的变更，至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这样，一所有着近千年办学历史的古老书院，终于完成其近代化转型的历史使命，成为今日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全国重点大学。

然而，岳麓书院的文化生命并没有终止，这所办学悠久的古老学府在20世纪80年代又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因为岳麓书院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文化价值，其遗址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在湖南大学的主持下修复原貌并对外开放，现在来此参观访问者络绎不绝，它已经成为国内外各界人士寻访中国文化的重要目的地。另一方面，岳麓书院在修复的同时又逐步恢复其培养人才、学术研究的功能，它已经成为湖南大学下属的人文学科的教学、研究基地，纳入到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体系中，并获得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所以，许许多多来岳麓书院视察、访问、考察的政界要人、学界名流，在高度赞扬岳麓书院的历史文物价值的同时，也充分肯定它作为活的文化生命的现代意义。

岳麓书院曾经有过900多年办学历史及活的文化生命。在历经种种社会变局、政治动荡之后，岳麓书院仍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而弦歌

不绝，是因为她承担着使中华文化得以绵延不绝的文化创新、文化积累、文化传播的重要功能。在社会变革、文化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岳麓书院总是立身于时代的前头，成为新兴学术思潮的基地；总是通过不断地著书、刻书、藏书，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累积宝贵的精神财富；总是通过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士人，从而完成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今天的岳麓书院作为活的文化生命，一如既往，依旧以中华文化的创新、积累、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在这所古老的庭院中，现代学人仍在参加一次一次的学术聚会，仍在聆听一场一场的学术演讲，仍在撰写、出版一部一部的学术专著，仍在毕业一届一届的读书人。这一切，都在说明一个事实：岳麓书院的文化生命延续在今天，而且活出了新的意义。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岳麓书院学术文库》，其主要宗旨，就是继承岳麓书院的学术传统，继续为当代学术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尽绵薄之力。希望本文库能够传承古代书院的文化创造、文化积累、文化传播等功能，为现代学术文化做一点添砖加瓦的工作。

当然，当代学术文化，群星灿烂。我们只能根据岳麓书院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方面已经或正在形成的研究方向及特色，确立一些研究系列。本《文库》推出的第一个系列是湖湘文化研究系列。我们还将继续推出其他多个系列。本《文库》的作者队伍，除岳麓书院的在职教学研究人员、研究生以及来此讲学的专家学者外，还包括一些在本系列的研究中有学术见地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希望大家来共创今日岳麓书院的学术繁荣。

湘学的学术旨趣及其演变	朱汉民	(1)
魏源的经世思想	夏剑钦	(23)
曾国藩与经学	陈戌国	(34)
曾国藩的考据之学	梁绍辉	(53)
郭嵩焘的经学考据思想	王兴国	(78)
王闿运《春秋》学的解经特色及其时代意义	魏怡昱	(118)
王闿运的《春秋》学述论	冯晓庭	(183)
王先谦的治学成就与学术思想	梅季坤	(207)
商略古今，折衷汉宋——王先谦的今文《诗》学	陈致	(219)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对诗旨的拟定	张政伟	(251)
皮锡瑞的经学观——基于《师伏堂日记》的考察	吴仰湘	(273)
从《翼教丛编》看叶德辉的学术思想	张晶萍	(291)
翼孔正教：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礼经世述考	卢鸣东	(310)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灭国”词义论释之商榷	杨济襄	(344)
从湖湘到广东：书院课艺在晚清经学传述中的重要性	程克雅	(402)
《翼教丛编》的经典观	丁亚杰	(450)
中国内地学界魏源研究百年回眸	夏剑钦	(475)

台湾学者“魏源研究”述评	杨晋龙 (493)
近年来中国内地学界的郭嵩焘研究概述	王兴国 (535)
台湾学界对郭嵩焘研究之重要成果简述	车行健 (542)
台湾地区“王闿运经学”研究现况	冯晓庭 (555)
中国内地王先谦研究述评	吴仰湘 (561)
台湾学界王先谦研究简述	蒋秋华 (581)
中国内地皮锡瑞研究述略	吴仰湘 (598)
台湾学界皮锡瑞研究概况	蔡长林 (616)
中国内地叶德辉研究现状综述	张晶萍 (625)
台、港及海外地区近五十年来的谭嗣同研究	程克雅 (635)
台湾地区苏舆研究概况	丁亚杰 (649)
后记	朱汉民 (655)

湘学的学术旨趣及其演变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朱汉民

晚清湖湘之地成为中国学术文化异常活跃之地，引起了全国学界、政界的关注。这段时期的学风之盛亦集中在主流的学术形态——经学方面，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宋学等不同派别，均有一些代表性人物。尤其突出的是，晚清湖湘经学在学术旨趣、学术风格上，最鲜明地体现出湘学传统追求的“道”、“学”、“治”统一的特征。笔者认为，要想很好地把握、概述晚清湘学的历史与特质，离不开对这一特征的解析。

一、湘学学统与晚清学风

所谓湘学，是一个地域性的学术文化概念，特指两宋以来湖南地区所形成的学术文化与学者群体。湘学的形态和特点，在宋代就完全形成。南宋后期理学家真德秀对此有一段论述：

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盖前则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于春陵，以其心悟独得之学，著为《通书》、《太极图》，昭示来世，上承孔孟之学，下启河洛之传。中则有胡文定公，以所闻于程氏者，设教衡岳之下，其所为《春秋传》专以

息邪说、距诐行、扶皇极、正人心为本。自熙宁以后，此学废绝，公书一出，大义复明。其子致堂、五峰二先生，又以得于家庭者，进则施诸用，退则淑其徒，所著《论语详说》、《读史》、《知言》等书，皆有益于后学。近则有南轩先生张宣公寓于兹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尝临镇焉。二先生之学源流实出于一，而其所以发明究极者，又皆集诸老之大成，理义之秘，至是无复余蕴。此邦之士，登门墙承警教者甚众。故人材辈出，有非他郡国所可及。^①

可见在宋代，理学思潮已经大盛于湖南，并形成了地域性学术传统的湘学。以后，历经元、明、清各个朝代，这种知识传统与区域特点一直保存下来，得以延续、发展。

湘学的形成是在两宋时期，它的出现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现象，而是基于中国在这段时期内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史现象，即儒学演变为一个个具有地方特色、历史传承的地域学派，即所谓的“儒学地域化”。两汉时期儒学亦很鼎盛，但汉代儒学兴盛的契机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儒学就成为一个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它首先通过国家的学术中心和教育中心——太学，以研究和传播儒学。而宋代复兴儒学的思潮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文化思潮，宋学不是通过中央或地方官学，而主要是通过地方的书院来开展学术研究与传播。一批批立志于重振儒家价值信仰、重建儒学知识体系的新儒家学者集聚于各个地域的不同书院中，潜心著述、授徒讲学，于是，一个个具有各自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就形成了。在北宋时期，有孙复的泰山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兄弟的洛学、邵雍的百源学、司马光的涑水学、苏氏兄弟的蜀学；到了南宋，则又有朱熹的闽学、胡氏父子及张栻的湘学、陆九渊的象山学、吕祖谦的婺

^① 宋·真德秀《劝学文》，《真西山文集》卷 40。

学、陈亮的永康学、薛季宣等的永嘉学等等。各个地域的儒学学派均有各自的学术师承、学术基地和学术传统。

由于两宋时期理学学术思潮兴起、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特别是在上述的儒学地域化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之下，湘学开始形成并崛起。当江南各省的理学得以蓬勃发展之日，也是儒家文化迁移、渗透于南国并形成地域特色之时。两宋以后，有称湖南为“荆蛮邹鲁”、“潇湘洙泗”者，皆反映了以“邹鲁”、“洙泗”为标志的儒家文化在湖湘之地的深入渗透。

两宋时期形成的湘学，表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学术追求与文化特色呢？本人认为，将儒家文化中“道”的价值信仰，“学”的知识体系，“治”的经世技艺统一起来，防止出现语道者流于虚无好高之弊，为学者流于文辞章句之虚，致治者拘于刑名权术之偏，这应是湘学传统的学术追求。

首先，湘学学者追求“道”与“学”的统一。湘学在宋代形成，这种学术形态和宋学密切相关。宋学又被称为“道学”，因为这种学说以求道为其根本宗旨。先秦儒学过于强调现世的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而缺乏高深而精致的形而上之道作为精神支撑，而汉唐儒学的训诂考据及粗陋的天人感应又不足以建构这种“道”的信仰。宋儒以“原道”为旗帜，将儒家伦理的人文之道与终极存在的天道统一起来。所以，宋儒的“道学”从内容上来说是复兴儒家道德价值之“道”，但从其学术形态上来讲又是人道与天道的合一之“道”。由此可见，宋学思潮就是一种原道的思潮，它自身就包含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弘道精神。由于湘学一产生就是这个学术思潮的产物，所以，湘学就必然表现出强烈的将道与学统一的追求。湘学的奠基人周敦颐，为儒家伦理穷源探本而著《太极图说》，从而也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湘学的发展者胡宏、张栻，他们和朱熹一道综合前代的理学思想，使理学发展到集大成阶段；湘学的巨子王夫之，系统地总结了宋明理学的思想

精华，他不仅终结了宋明理学，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文化之道的历史转型。

另一方面，湘学学统亦注重“学”与“治”的统一。注重经世致用向来就是湘学传统的重要特色。胡安国持《春秋》经世说，通过注释《春秋》宣传康济时艰、抗金复国的政治主张。胡宏的《知言》亦以重济世为特色，所以有人认为：“晦庵学说与五峰稍不同，故所作《知言疑义》颇多微词。殆五峰以康济为功，晦庵以涵养为事，目的不同，而造诣遂异歟！”^①张栻及其弟子也皆以抗金救国、经邦济世的成就而闻于一时。湖湘学派这种经世致用的特色，发展为一种区域性的学术传统。明清以后，湖湘人才层出不穷，他们大多以经世致用的主张和成就称世。王夫之是著名学者，但他以抗清复明为头等大事，在举兵起义、出仕南明的政治斗争失败以后，才潜伏下来，通过研治学术来表达自己的经世致用之志。

总之，湘学学统中表现出一种鲜明的特色，就是力图将道、学、治统一起来，从而使知识学问不至于成为一种空疏的章句之学、一种脱离现实的纯知识。这种学术传统到了晚清，得到了湘学学者的继承和发扬。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代表着中国古代学术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乾嘉学者一改宋明理学热衷于讨论道器、理气、有无、心性、动静的义理之学，转而潜心研究历史文献，重视对历史典籍的考据训诂。他们皓首穷经，在传统学问的基础下不断扩展，形成了新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金石学等等；而在有关价值关怀以及国计民生方面，他们却又显得不足。本来，对于儒学而言，追求知识学问与“道”的价值信仰、“术”的经世技艺应该是一个整体。但是，乾嘉学者的知识学问却脱离了人文信仰的“道”与经世技能的“术”，

^① [清]《艺文》、《崇安县新志》卷 18。

那么，儒学所具有的维护人心世道、辅助经世治国的功能就会弱化。这一点，连乾嘉学者亦已发现并深感忧虑。段玉裁、阮元均为一代考据学派的大师，他们也深深感到，如果一味沉溺汉学、不讲宋学，则会有“气节败、政事荒”的严重弊端，从而引起儒者的“人心世道之忧”。^①

所以，就在乾嘉汉学大盛之后的道光年间，中国的学术界又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据王国维说，清朝三百年间学术思潮发生过三次大的演变。他说：“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②学术界之所以会出现道光、咸丰以来的又一变迁，就在于乾嘉汉学的学术倾向导致了儒家士大夫们的“人心世道之忧”。而这一学术风尚的转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现了今文经学派，一是出现了理学经世派，前者以魏源为代表，后者以曾国藩为代表，他们均是清代湘学中的重要人物，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们身上均体现出将道、学、治统一起来的学术旨趣。

二、魏源的学术旨趣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年间进士。早年曾从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学《公羊春秋》，晚清时期重要的今文学家，近代著名思想家，与龚自珍并称“龚魏”。清朝乾隆、嘉庆以来，学术思想界盛行以考据训诂为主流的学术思潮，这种学术思潮很快亦暴露出严重弊端，那就是使知识学问脱离国计民生和生活实践，儒学的社会功能日渐丧失。魏源等继承了汉代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传统，以竭力扭转当时的学风。

魏源是一位开一代学风的经学家，他彻底否定了“治经之儒与明

^① 清·陈寿祺：《孟子八录跋》，《左海文集》卷7。

^②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23。

道之儒、政事之儒，又泮然三途”的局面，将学术界已分裂为三的道、学、治重新统一起来，从而继承和弘扬了湘学的学术传统。

魏源学术思想的代表作《默觚》共分上、下两篇，上篇论学，下篇论治，正表达出他在学术思想方面的重要特色，就是将“道”的人文关怀与“学”的知识追求、“治”的经世情怀统一起来，从而实现儒家人文理想——道、学、治的统一。我们也将从“学”与“治”两个侧面来讨论这一特色。

首先，是“道”与“学”的统一。

人们发现，宋儒的特点是将“道”的价值信仰与“学”的知识体系结合起来，并且强调儒家义理道德的至上性。魏源是晚清时期倡导今文经学、呼唤经世致用的开新风人物，他仍然是将“道”与“学”的统一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他说：

且夫文质再世而必复，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今日复古之要，由诂训、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

由训诂、声音到典章制度，是由文字学到历史学的探求，这是乾嘉汉学的知识学特色；由乾嘉古文经学的训诂考据，再发展到道光时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今文经学才使得“天道”明朗起来，也就是完全达到“至道”的境界。在魏源看来，后者才是自己学术追求的目标。

为什么只有西汉今文经学家算是“至道”呢？乾嘉汉学推崇东汉古文经学，这一学派的特征是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是考证的；而今文经学的研究则重在阐发经典中的“微言大义”，这“大义”就不再是知识方面的文献考据、典章制度，而是现实的政治方略和人文价值，即儒家的“圣人之道”，它们均属“道”的范畴。

魏源充满着对“道”的关怀和执著，但是，他坚信“文之外无道”，^①也就是说，“道”是通过儒家经典、历史文献方得以一代代传递下来，那么，学者的使命就是要以“学”为本，在那些经典、文献中探寻“微言大义”，也就是探寻“道”。魏源潜心于经典、文献的研究，广泛地求师问学，他“问宋儒之学于姚敬堂先生壎，学《公羊》于刘申受先生逢禄”。^②他在研治经学时留下了大量的著作，主要有《诗古微》、《书古微》、《董子春秋发微》、《公羊春秋论》、《孝经集传》、《礼记别录考》、《易象微》、《大戴礼记微》、《论语类编》、《孟子类编》等。魏源因对经史的研究而得到学术史家的肯定，如梁启超说：“道光末，魏源著《诗古微》，始大攻《毛传》及《大小序》，谓为晚出伪作。其言博辩，比于阎氏之《书古微》，且亦时有新理解。……源又著《书古微》，谓不惟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即阎氏所攻者）为伪也，东汉马、郑之古文说，亦非孔安国之旧。”^③可见，魏源的经学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亦有重要价值，这是他潜心于“学”的结果。

但是，魏源并不像乾嘉学者那样，将学术的关注点完全放在文史的知识学方面，而是坚持“学”与“道”的统一。他在为自己的《书古微》作序说：“《书古微》为何而作也？所以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义，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④他所说的“微言大义”，也就是他所追求的“圣人之道”，这才是他研治经学的重点。他说：

圣人忧患天下来世其至矣！删《诗》、《书》，正礼乐，皆

^① 魏源：《默觚上·学篇三》，《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8页。

^② 魏源：《邵阳魏府君事略》，《魏源集》，第948页。

^③ 梁启超：《清代今文学与龚魏》，《清代学术概论》，第22页。

^④ 魏源：《书古微序》，《魏源集》，第109页。

述而不作，有大义，无微言，岂预知有《论语》为后世入道门哉？假年绝韦来，天人性命之理，进修聚辨之方，无咎寡过之要，胥于《易》乎在，子思本祖训发挥之，故《中庸》一《易》道也。……盖《易》、《论语》明成德归，《诗》、《书》、《礼》、《春秋》备经世法，故《坊记》以《春秋》律《礼》，《缁衣》以《诗》、《书》明治，体用显微，同源共贯，于道之大则能不者，其亦具体而微矣。^①

他所要探索、阐发的“大义”，包括了“天人性命之理”、“进修聚辨之方”、“无咎寡过之要”的“大道”，并在“体用显微”的儒家经典中均有全面的体现。他认为，后人学习儒家经典，就是要探明其“大义”，也就是探明“圣人之道”。他在为《论语孟子类编》作序时亦强调：“夫圣人之道，大而能博，贤人学之，各得其性所近。故圣人之言必引而就卑，不如此则人不亲；贤人之言或亢而自高，不如此则道不尊。且教法因人、因时，原无定适。”^②这一切，均表明他对“大义”的兴趣，对价值关怀、人文信仰的“道”的强烈关注。

魏源不仅仅倡导“学”与“道”的统一，还强调“道”、“学”与“治”的统一，他总是以通经致用为根本目的，将经术和治术统一起来，使得“道”与“学”的统一，最终要通过“治”方能获得真正的实现。

在上面谈到魏源的经学思想时我们已经发现，他不仅要在经学中求“道”（大义），而且更加强调此“道”与“治事”活动保持有内在联系，所谓“以其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谓之经”。^③“经”不仅是天下后世得以“求道”的文本，尤其是要能获

^① 魏源：《子思子章句序》，《魏源集》，第144页。

^② 魏源：《论语孟子类编序》，《魏源集》，第146页。

^③ 魏源：《默觚上·学篇九》，《魏源集》，第23~24页。

“制事”的功效。而且，在“道”与“治”的关系上，他强调“治”的外在功用与“道”的价值信仰的统一，标榜出他与宋儒的明显区别。他说：

三代以上，君师道一而礼乐为治法；三代以下，君师道二而礼乐为虚文。古者岂独以君兼师而已，自冢宰、司徒、宗伯下至师氏、保氏、卿、大夫，何一非士之师表？……自孔、孟出有儒名，而世之有位君子始自外于儒矣；宋贤出有道学名，而世之儒者又自外于学道矣。……有位与有德，泮然二途；治经之儒与明道之儒、政事之儒，又泮然三途。^①

他痛心于有位者之治和有德者之道的分裂，感叹于“治经之儒”、“明道之儒”、“政事之儒”的三途。他倡导通经致用，就是力图将“治”与“道”统一起来，使“治经”、“明道”、“政事”三者合为一途。否则的话，离开“治经”、“明道”的“政事”，必会失去方向而败坏；离开“政事”的“治经”、“明道”，则又必会空疏无用。

所以，在“道”、“学”与“治”的关系上，魏源一直坚持三者的统一。首先，为了防止清乾嘉之时学术思想界的沉溺烦琐考据之习，魏源往往将治事的外在功用放在更加显著的地位，要求将治事的务实活动贯彻到治经中去。他说：

曷为道之器？曰“礼乐”；曷为道之断？曰“兵刑”；曷为道之资？曰“食货”。道形诸事谓之治；以其事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谓之经；藏之成钩、辟雍，掌以师氏、保氏、大乐正，谓之师儒；师儒所教育，由小学进之国学，由侯

① 魏源：《默觚上·学篇九》，《魏源集》，第23~24页。

国贡之王朝，谓之士；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①

魏源认为，有关“礼乐”、“兵刑”、“食货”等国计民生的治事，是儒者之经的基本内容；“经术”不能再流弊于“训诂音声”、“名物器服”、“象数”、“鸟兽草木”等烦琐的考证，而是要以“经术为治术”，“通经致用”。在这里，他已将“治”放在更加显著的地位，而和宋儒大不一样。

因此，魏源坚决反对那些只会空谈心性、闭门修养的腐儒，这些人自以为是“明道之儒”，却对国计、吏治、兵赋等不闻不问，一味谈义利之辩、王霸之分，这完全是一种脱离治事实用的恶习。如果说乾嘉之学是将“学”与“治”分离开来的话，这种理学末流则是将“道”与“治”分离开来。魏源说：

后儒特因《孟子》义利、王伯之辩，遂以兵食归之五伯，讳而不言，曾亦思足兵、治赋皆圣门之事，农桑、树畜即孟子之言乎？抑思屈原志三后之纯粹，而亦曰“惜往日之曾信兮”，“国富强而法立”，孔明王佐之才而自比管、乐乎？王道至纤至悉，井牧、徭役、兵赋，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间。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以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②

① 魏源：《默觚上·学篇九》，《魏源集》，第23~24页。

② 魏源：《默觚上·学篇九》，《魏源集》，第36页。